

研究论文

亮点:

- 梳理叶荣钟对鲁迅、周作人思想的接受和转化
- 辨析叶荣钟研究中的“左右之争”难题
- 探究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

*通讯作者邮箱:

xujiyang@fjnu.edu.cn

英文引用: Xu et al., 2025. Shadows of May Fourth: Lu Xun and Zhou Zuoren in Ye Rongzhong's Intellectual World. Evidence in East Asian Humanities and Arts, 1(01), 28-39.

中文引用: 徐纪阳, 2025. 五四之影: 叶荣钟思想里的鲁迅和周作人. 东亚人文艺术研究, 1 (01), 28-39.

稿件处理节点:

接收 2025 年 2 月 13 日
修订 2025 年 3 月 2 日
接受 2025 年 3 月 10 日
发表 2025 年 3 月 12 日

基金资助:

本篇文章未接受任何基金资助。

版权:

本作品原创内容可依据《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条款使用。任何对本作品的后续分发须标明原作者及作品标题、期刊引用及 DOI 信息。

五四之影：叶荣钟思想里的鲁迅和周作人

徐纪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 鲁迅和周作人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两种不同的精神范式和发展方向，而叶荣钟却同时受到二者的影响，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现象。在日据台湾的历史语境中，叶荣钟通过对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接受与转化，在1930年代的前期就形成了以启蒙主义为基底，向着“左翼关怀”和“民族意识”两个方向延伸又不断交叉融合的思考路径，构成其思想的基本结构。通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既可化解当前叶荣钟研究中关于其立场的“左右之争”难题，同时亦可通过考索叶荣钟思想里隐而不彰的左翼脉络，解释其晚年在国民党当局的严苛统治下，最终走向认同现实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之路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台湾文学；鲁迅；周作人；左翼；民族认同

Shadows of May Fourth: Lu Xun and Zhou Zuoren in Ye Rongzhong's Intellectual World

Jiyang Xu ¹

¹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Lu Xun and Zhou Zuoren represent two distinct spiritual paradigms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The simultaneous influence of both thinkers on Ye Rongzhong constitutes a rare phenomenon in literary history.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Ye Rongzhong creatively transforme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epitomized by the Lu Xun and Zhou Zuoren, and by the early 1930s had established an intellectual framework rooted in Enlightenment ideals. This framework extended into two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 "left-wing concern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which continuously intersected and fused, forming the foundational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Through structural analysis, this study not only resolves the ongoing scholarly debate over Ye Rongzhong's ideological "left-right" stance but also traces the latent left-wing lineage within hi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Doing so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behind his eventu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is later years, amid the Kuomintang regime's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Lu Xun; Zhou Zuoren; Left-wing Thought; National Identity

1. 与周氏兄弟“相遇”

鲁迅和周作人犹如中国现代文化的双子星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和精神范式。一些知识分子因亲近鲁迅而拥有了现实的批判力与战斗力，走向搏击与抗争的左翼之路，另一部分人则追随周作人遁入悠远的文化空间，表现出消极避世的隐逸之风，这两种思想路径与文化形态泾渭分明、鲜有交叉，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几乎找不到同时受到周氏兄弟双方面影响的知识个体。不过，近年来逐渐受到两岸学界重视的台湾文人叶荣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周氏兄弟“异影同构”的极佳例证：鲁迅和周作人这样两个形象迥异的文化个体投射于叶荣钟的精神世界，二者竟然相互交错融合，搭建出叶荣钟思想结构的基本骨架，构成其一生文化、政治选择和民族认同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五四新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的全新经验，是值得探讨的思想文化现象。

叶荣钟（1900-1978）祖籍福建泉州，出生于台湾鹿港，幼年入书房（私塾）读古典汉文，九岁丧父后家道中落，得其恩师施家本引荐，受林献堂资助而得以两度赴日留学，返台后长期担任台湾文化抗日运动先驱林献堂的私人秘书兼翻译，前半生从事抗日的政治社会运动，积极谋求改变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命运，台湾光复后则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治下避于书斋、潜心著述。他早年以林献堂幕僚的身份撰写公告、演讲稿、新闻稿等政论性文书，亦参与《南音》等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撰写文学评论及从事旧体汉诗创作，晚年著有《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日据下台湾大事年表》《近代台湾金融经济发展史》《台湾人物群像》，并有旧体诗集《少奇吟草》、散文集《半壁书斋随笔集》等。叶荣钟一生经历丰富，著述广涉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领域，是名副其实的文史大家，却长期默默无闻地隐于民间，近年来对他的研究虽有逐渐增多之势，但整体而言重视度还不够。

徐纪阳，2025

揆诸学术史，早在1970年代，叶荣钟就获“台湾散文第一家”之美誉^[1]。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被“台独”论者标举为“本土散文家”^[2]以来，随着台湾“本土意识”日趋泛滥，台湾学界的叶荣钟研究被“本土意识”裹挟，严重扭曲了叶荣钟的本来面目^[3]，对此亦不断有学者进行纠正^[4]，相关研究始终在叶荣钟的知识立场、民族观念、国家认同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分歧。在叶荣钟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这一议题上也有相应展开，如廖振富最早披露了叶荣钟手稿中抄录鲁迅旧诗的现象^[5]，徐秀慧则从文学、民族与革命三方面就叶荣钟和鲁迅展开比较研究^[6]，但受意识形态和资料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仍留有讨论的空间。笔者通过对叶荣钟全集的阅读，发现其中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虽然微弱，却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倘若利用有限的线索在历史资料的留白处再建叶荣钟与鲁迅、周作人之间的思想关联，可勾勒出叶荣钟思想的基本结构，并就此对叶荣钟研究中的分歧作一回应。

叶荣钟与周氏兄弟没有直接的交往。生平仅有的一次与周作人的间接联系，是通过游学北平的好友洪炎秋向其索字，这是叶荣钟一生中最“接近”周氏兄弟的时刻。据叶荣钟1931年4月8日日记：“老棧（即洪炎秋——引者注）写信来说周作人已答应写字给我了。”^[7]钦慕之情溢于言表。在叶荣钟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鲁迅和周作人的次数不多，所见仅限于《中国新文学概观》及两篇《文艺时评》^[8]。但梳理较为私人化的日记、手稿及藏书目录等，会发现鲁迅和周作人实际上长期存在于叶荣钟的思想背景中。

叶荣钟日记不是完整的年代记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1-1942年间，尽管每年都有日记，但并不完整，最长的年份有11个月，而有的年份的日记仅只数天；第二个阶段是1946年参加台湾光复致敬团到大陆旅行，留下全程42天的日记；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到其去世的1978年，除1966年只有3天的日记和1977年下半年日记不存之外，这13年间的日记较为完整。在1931-1942年间的日记中，叶荣钟提及鲁迅和周作人各5次，远高于只出现

过2次的胡适、郭沫若，以及只出现1次的梁启超、郁达夫、林语堂、俞平伯；在1966-1978年的日记中，鲁迅、周作人出现的频率更高，常有频繁与友人借还周作人作品集或连续数天阅读鲁迅的记录。

从其日记中的书账和未出版手稿中所列藏书目录来看，叶荣钟收藏有不少鲁迅和周作人的书籍，其数量明显超过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著作。在一份手书于1945年的“鲁迅著作目录”中，共列出鲁迅著作28种；在另一份约编于1972年8-9月间的藏书目录中，计有鲁迅著、译的书13种共计15册，周作人作品11册。^[9]而在现存的手稿中，不仅有叶荣钟晚年抄录的鲁迅古体诗30余首，还有大量阅读周作人散文后所做的摘录，而无抄录其他作家的痕迹。这些证据说明叶荣钟对周氏兄弟的关注要远高于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不仅如此，叶荣钟手稿中还有更多与周氏兄弟相关的问题，比如他抄写的《惜花四律》《莲蓬人》这两首诗，是到1950年代周作人早年日记披露以后才为世人所知，时至今日，这两首诗之权属到底应归于鲁迅还是周作人，在鲁迅研究界仍有争议。^[10]对于叶荣钟而言，在台湾谈“鲁”色变的“戒严”年代里，他是从何种渠道读到这两首诗并作了抄录的，从现存的日记、书信及藏书书目中尚无迹可寻，这一有待厘清的问题本身也是鲁迅在传播史上有趣的议题。

上述情况表明，叶荣钟对周氏兄弟的阅读远超过据现存文字所了解的部分。据此推定，鲁迅和周作人确实一直存在于叶荣钟的思想中，并可能在其思想的构成中起到某种特殊的作用。

2. 启蒙主义、左翼关怀和民族意识

叶荣钟早年接受传统的书房（私塾）教育，在1927年之前只写作过旧体诗而无新文学创作和相关论述。不过他早就接触到中国大陆晚清以来思想文化变革的思潮，开启了新文化的视野，为后来走近鲁迅和周作人奠定了基础。

徐纪阳，2025

据叶荣钟年表，叶荣钟在1917年就“接触到《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等之新思想议论”^[11]，并在林献堂的鼓励下于1920年参与反殖民的民族文化与政治运动。1921年，叶荣钟在《台湾青年》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题为《求之于己》（原文为日文）的文章，“可以说是叶荣钟后半生参与台湾民族运动的宣言”^[12]，文中表达了明确的思想启蒙与反殖民诉求。如果考虑到《台湾青年》是“新民会”、“东京台湾青年会”模仿《新青年》而创办的一份启蒙杂志，则基本可推定叶荣钟此时已经接触到大陆新文化运动。《台湾青年》后改组为《台湾民报》，后作为台湾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被称为“台湾人之唯一喉舌”，乃是1920年代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舆论和文化阵地。台湾最早对新文学的提倡和对大陆新文学的介绍就发生在《台湾民报》上。因此，从1920年就参与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叶荣钟应该对1925年前后《台湾民报》介绍的中国大陆新文学的风潮有一定了解。几乎同时，同属台湾文化协会的庄垂胜（字遂性）、蒋渭水等人开办中央书局和文化书局，从大陆大量购入书籍^[13]，叶荣钟也从中获知大量的大陆文坛信息^[14]。可以说，叶荣钟对中国大陆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关注，在1927年之前虽为其社会活动及旧体诗创作所遮掩，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其思想中的暗流。

上述经验带来他第二次留日期间（1927-1929年）对中国大陆新文学作品的狂热阅读。他后来回忆：“当时我正热衷于中国新文学。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的作品，几乎无所不读。晚间非到午夜一两点钟不能就寝，彻宵不寐亦是常事。”^[15]这打开了叶荣钟的新文学视野和论述空间，激活了他思想中早已存在的启蒙因子。这一时期他在《台湾民报》发表关于文学、语言和戏曲问题的论文近10篇，并写下被公认为两岸文学交流史上重要文献的《中国新文学概观》^[16]。在这篇长文中，叶荣钟对中国新文学以来的文坛状况作了整体性的观照，按照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并重点介绍了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

等人的创作，显示了叶荣钟对中国新文学的全面了解。该文中，叶荣钟以极大篇幅阐述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贡献，视他们为中国文学整体性变革的象征和“五四”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

这一时期，叶荣钟在文学上坚持“五四”的启蒙主义，希望“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17]。他延续五四新文学抨击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思路，借助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概念，大力批判台湾的“贵族文学”，认为台湾文学应借力于民间文学走向大众，其观点既有“五四”启蒙主义的特征，又提出了大众化的要求。他指出，台湾文艺界应该抛弃那些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都已过时的旧剧和过于高蹈的“坐在象牙塔里打盹”的“纯文学的戏曲”，建议作家借鉴街头的“无产阶级派的演剧运动”^[18]，创作出“多数民众能够吸收思想、文艺的生产品”^[19]。同时，叶荣钟提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乡里去”，“以身作范去指导民众”^[20]，以“涵养大众的趣味和品性”^[21]。这种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既“普及”又“提高”的综合辩证的大众化设想，和他对台湾“普罗文学”单方面强调普及而忽视文化素养提升的反思相关。论者多认为叶荣钟“支持‘民间文学’”、提出“第三文学”论，都“是强调文艺的‘启蒙’作用”^[22]，而非偏重于“阶级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叶荣钟1930年前后的新文学论述存在着左翼的动向，这一点从他对作家左倾的特别兴趣可以看出来。比如当他从日本文坛得到关于郁达夫“方向转换”的传闻后，便非常希望“读到他左倾以后的作品”^[23]；更由于1929年以来不能接到鲁迅的作品而“很感到寂寞”，“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24]。此时，叶荣钟的目的是以鲁迅所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校正台湾文学之偏差的理想标杆，探索台湾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无疑也暗示了叶荣钟思想中潜在的左翼因子。

另一方面，叶荣钟又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的“民间”概念衍生出民族主义的论述，将“民间”作为台

徐纪阳，2025

湾人汉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载体和象征。1937年年初，叶荣钟盛赞李献璋所编《台湾民间文学集》“材料丰富而精彩，……不愧为空前的著作”。在这篇发表于《大阪朝日新闻》的文章中，叶荣钟概括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由口到耳传下来的歌谣文字化”^[25]。其中虽未提及民族主义的要素，但是如果将民间文学的整理运动置于1920年代以来台湾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所推动的一系列文字、文学和文化改革的背景中，则台湾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整理与研究，乃是一种“保存我族文化、肯定自身传统、标帜我族特色并强化民族认同的努力”^[26]。因此，台湾民间文学的“文字化”彰显着一种反殖民的权力关系，蕴蓄着文化抵抗的势能。在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文化控制进一步收紧之际，对于“民间性”的强调正是“民族性”的张扬。这一推测亦可证之于叶荣钟1941年的一则日记。在这一年9月10日的日记中，他将“民间”的意义提升到与台湾历史、台湾政治运动史同等的高度，并有承担这一使命的自我期许：“近来觉得关于台湾的民间传承非大加整理一下不可。这层与台湾历史及台湾政治运动史皆是不可不写的。这个使命我虽有舍我其谁的自负，但是不知何日方克专心从事这民族的事业。思之未免为之黯然。”^[27]由此亦可见，他晚年为台湾民族运动写史也是上述整体思路的延续。

对叶荣钟来说，“民间”既是其沟通大众的重要途径，又是民族主义论述的有力支撑。他反对旧的“贵族文学”，同时着重发掘新的大众的“民间”，是五四新文学观在台湾语境下的展开。可以说，叶荣钟早年的文学观复杂多元，是晚清文学改良、五四文学革命、左翼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观念的混合，但仍可归结为是以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为原点的发散，可看出青年叶荣钟思想上多向探索的努力。在1930年代的前期，叶荣钟在文化活动中借力于鲁迅和周作人，形成了以“五四”启蒙主义为基底，向着左翼关怀和民族意识的两翼展开又不断融合的思考路径。1932年后，

叶荣钟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再未出现鲁迅的名字，但在 1942 年之前的日记中，仍有不少购、读鲁迅书籍的记录，鲁迅作为一个参照性的左翼坐标始终存在于叶荣钟的思想中。不过，由于持续参与右翼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受 1949 年后长期“戒严”环境的影响，叶荣钟思想中的左翼线索更深刻地内隐了。这也带来人们对其思想立场的认知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其思想作一专门的辨析。

3. 思想光谱的左与右

学界对叶荣钟思想光谱的定位历来有相当的歧异。早在 1954 年，1930 年代《南音》杂志的发行人黄春成就将叶荣钟视为“收租派的社会主义者”^[28]，呈现出叶荣钟内在意识的复杂性。后来洪铭水^[29]、张桂华^[30]、徐秀慧^[31]等人在台湾左翼思潮的脉络中考察叶荣钟思想，叶石涛^[32]、崔末顺^[33]、许倍榕^[34]、赵勋达^[35]、张俐璇^[36]等人则认为叶荣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右翼政治立场。而陈芳明在 1990 年代视叶荣钟为左翼文人^[37]，却在 2011 年的《台湾新文学史》中将叶荣钟置换到右翼运动的线索中^[38]，黄月银则直接将叶荣钟的立场界定为“中间偏左”^[39]，这就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上述情况说明叶荣钟内在思想和外在形象确实存在极为复杂的一面。但如果将叶荣钟的政论和文论加以区别对待，就不难理解上述分歧产生的原因。

日据时期，由林献堂等大地主及新起的本土工商资本家所推动的政治改良运动，一般被视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右翼。^[40]叶荣钟早年的政论多是作为林献堂的私人秘书，在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地方自治同盟等民族运动的过程中代拟的文件、声明等，其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右翼色彩是较为明显的。而其文学批评则受到世界性的左翼风潮尤其是中国大陆、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申说无产与弱小者的悲哀，带有左翼文学的特征。二者“左”“右”牵掣，在叶荣钟的思想中构成矛盾的张力，研究中如果只注意到单一的方面，就难免产生上述众说纷

纭的现象。但是，叶荣钟的政论因温和抵抗殖民的迂回策略而隐匿了反抗之声，又受制于他所服务之地主资本家集团而无法明言阶级关怀，因此左翼色彩不甚明显。在长期为林献堂、杨肇嘉、陈炯等代笔的过程中，叶荣钟的政论必须贯彻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这些只要翻阅《叶荣钟全集》并辅以林献堂日记即可有直观的感受；同时，由于必须在日本人允许的“合法”范围内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因此递交给殖民当局申论台湾人政治权利的文件中，叶荣钟常常将台湾人与“中国人”相区隔，以使得台湾人看上去具有某种日本属性，但是在同一时期的文学论述中，论及包含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时却多以“国人”谓之。两相比较，其间策略性的权宜、变通意味颇为明显。可以说，叶荣钟政论外溢的右翼意识，不过是其民族意识与其职业活动相叠加留给世人的印象，并不代表他完全认同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说，叶荣钟职业行为下的“论说”即使收入其全集，严格来说也不应视为其思想的构成部分，其中的情感体验也是与实际感受有距离的。

从叶荣钟个人经历来看，其生命感受更趋向于阶级认同。一方面，童年家道中落的底层生活经验孕育他天然的左翼情怀；另一方面，他追随林献堂参与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会通过台湾文化协会中长期存在的左右路线之争而对左翼思想有一定的理论理解。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全球左翼风潮的影响下，叶荣钟童年的底层生活经验、青年时期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经历和新文学的阅读体验相叠加，带来他对日本左翼戏剧理论的关注，并运用于他 1929 年之后的戏剧批评实践中。对于叶荣钟来说，文学才是心灵的个性化表达，与内在思想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在发表于 1929 年 1 月 8 日的《堕落的诗人》一文中，他曾引鲁迅译厨川白村的话：“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可以离开外界的抑压强制，立于绝对自由的心境去表现个性的唯一之世界。”^[41]正如张重岗指出的，文学及相关论述是叶荣钟内在意识建立的重要途径。^[42]文学建立了叶荣钟独立于地主资本家集团的精神主体，这

就为探讨叶荣钟的思想的复杂性打开了另一条通道。

张重岗隐约意识到叶荣钟和鲁迅在阶级和民族问题上与鲁迅的相通之处^[43]，在这样的提示下再看台湾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叶荣钟提出的颇有争议的“第三文学”论，就极易令人联想起鲁迅批判过的表面宣扬超阶级、实际反对左翼文学的“第三种人”理论。张桂华就将“第三文学”的“超阶级性”解释为“反阶级性”，认为“第三文学”排斥台湾新文学中的无产者论说，是对左翼文学的挑战。^[44]但反思左翼文学并不等于反对左翼文学。叶荣钟反对空洞的左翼说教却不放弃启蒙大众、联合大众，始终践行以“启蒙”为先导的“联合”，其着重阐发对抗殖民者文化的“全集团的特性”的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文化启蒙的要求和朴素的左翼情怀。正如施淑指出的，叶荣钟“第三文学”的“全集团性”是“含有弱小民族文学的政治诉求的”^[45]。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文学”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言是右翼的民族主义文学论述，恰恰相反，其对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和“大众化”的双重强调，已经非常接近于鲁迅后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思路。可以说，“第三文学”论混合了文学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双重经验，试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连接点，其中既有阶级立场的坚持，又有民族主义的诉求。

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首要目标是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回中国。但对彼时的叶荣钟而言，中国只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文化情感的复合体。他曾自述，像自己这样“在日本据台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祖国只有漠然的观念，因为它是手摸不到、脚踏不着的存在，没有切实的感觉。”^[46]其民族情怀并非对特定政权的政治认同，而是一种被殖民压抑感而强化的对祖辈原乡的向往。这客观上是因为当时“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因外部的干扰和内部的混乱始终处于未成熟的状态之下”，没有“一个稳定的完整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47]。就叶荣钟的内在感受而言，他在鲁迅

“自从蒋皇帝登基以来”“用笔写还不及用脚跑来的快”^[48]的窘境中，深刻地透视了国民党政权的右翼本质，尤其是光复后台湾严酷的“戒严”体制下的经验，更现实地强化了这种感受。叶荣钟的中国认同，在很长的时期中始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非对一度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当局）的认同。这种朝向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政治上对国民党政权的不信任，恰恰表明叶荣钟思想始终与右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4. 祖国认同的情感机制

叶荣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可从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中窥得一斑。在古典文学的一面，和日据时期诸多台湾知识分子以古典汉诗抒情咏怀并作为一种文化的抵抗一样，叶荣钟 18 岁即有“伤心莫问旧山河，奴隶生涯涕泪多”这样直观地描述殖民地人民悲苦、隐含民族抵抗之声的诗作^[49]，此后的他一生写有汉诗逾 700 首，创作时间长达 60 年。而在现代文学一面，叶荣钟接续了周氏兄弟的散文一脉，并通过散文连接到古文传统和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脉络，洪铭水认为这一文体与传统的关联正“是叶荣钟在各类新文学创作中钟情于散文的原因之一”^[50]。曾受到梁启超影响的叶荣钟，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将政论和散文合二为一，而是始终在二者之间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其政治论说多为“受命”之作，而散文则显然是“自己的园地”。在“五四”时期的散文家中，叶荣钟最赞赏的是鲁迅和周作人^[51]，青年时期创作过少量的类似鲁迅小杂感的随笔，但多数散文更近于周作人的平淡之风。

叶荣钟散文的“两幅笔墨”到其晚年则更为显著，不仅有周作人散文的避世之风，也不乏鲁迅杂文抒愤之气。《谈乌鱼》《也谈故乡鹿港的点心》《忆童年的农历过年》《记鹿港中元的民俗》《鹿港查晡》《盐滩沧桑》《记落地扫与诗艺阁》《庄太岳作鹿港竹枝词笺释》等随笔，围绕其故乡鹿港的饮食、节庆、人物、民间文艺、民族风情等，颇类周作人

吃茶喝酒、谈草木虫鱼、谈风土人情的闲适文章，文风静穆冲淡、舒缓质朴。张良泽曾赞叶荣钟散文中有“丰富的中国学问……举凡中国的典章制度、文章典故皆能谙熟。”

^[52]是看到叶荣钟作品也不乏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谈论中国文化、俯仰宇宙人生、洞察人情世相的篇章，如《发》《火》等皆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在类似周作人平和冲淡的风格之外，这一时期叶荣钟的《也谈民主》《复古调》《近感五则》《悲哀的现实》《婚礼》《为破除迷信而战》等随笔也直击社会、文化、政治的弊端，表现出了强烈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批判性格，既继承了周作人早期散文浮躁凌厉的风格，更与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一脉相承。廖振富将这一系列文章的内容概括为“批判特权、贪污等政治歪风”、“批判社会风气注重现实而丧失理想”、“批判宗教之商业化与民众迷信之风”、“批判新闻媒体媚俗与知识分子之堕落”^[53]，即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明批评的一面，叶荣钟既看到了民间文化的清新刚健、自然健全，又洞察到历史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中的野蛮、迷信、愚昧在民间的沉积，这一点和周氏兄弟对民众、民间文化的清醒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上述通过叶荣钟的散文对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做了较为宽泛的知识性描述，倘要进一步分析这种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叶荣钟那里如何与现实中国发生经验性的关联，则应就《祖国河山的一角——东北安东县的印象》一文讨论其复杂的情感转换机制。这篇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回忆了1933年叶荣钟前往朝鲜考察地方自治制度，在越过边境逗留安东县城“触到祖国的实体”的半日光景中，所萌生的一种对于祖国憧憬的“嗒然若丧”的失落感。虽然当时其脑海里“没有一个具体的影像”作为“祖国的标准”，但显然，是那个跛脚走唱的流浪者弹唱的曲调，让他获得民族情感的热烈“共鸣”：

那残废的左脚将拐子交定，凑成两脚以保持身体的均衡，然后自拉自唱……他的声调是那么苍凉凄厉，

徐纪阳，2025

态度是那么自然，一点都没有摇尾乞怜的自卑感。我完全被他吸住了，京调我一窍不通，好坏无法判断，但是内心却会发出热烈的共鸣。这是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只是感激，只是向往，只差没有掉下眼泪而已。……勉强来讲或者可以说是“血”的共鸣？^[54]

叶荣钟晚年回顾这一经验时，仍难以说清其中复杂的情感机制。不过这一场景下呈现的民族情感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叶荣钟1929年关于《阿Q正传》的评价。叶荣钟指出阿Q愚昧卑怯、欺软怕硬的国民劣根性，有怒其不争的一面，但更哀其之不幸。他通过《阿Q正传》看到的是“深刻的‘人间苦’”，强调阿Q“是一个平凡庸碌的青年”，和多数中国青年一样“受着贫富不均等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着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着旧礼教的束缚。”《阿Q正传》“表面是写一个阿Q，里面却是写一个中国”，是“中国民族的好写照”——“在国际间的中国，与其说是可憎恶的表现，毋宁说是可怜悯的存在较为恰切，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太愚昧、太庸碌的缘故。”^[55]正因了对中国的这种理解，当1933年叶荣钟在祖国山河一角的“古老市容”中怅然若失不断自问“这就是祖国吗”时，他才能投射自己作为殖民地子民压抑悲凉的心绪于文中的流浪歌者：其“苍凉凄厉”的声调共通于殖民地台湾人民的悲哀，“没有摇尾乞怜的自卑感”也恰是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叶荣钟的自我要求。换言之，“这种歌声及其背后的人格精神，与他本人的人格精神相呼应，将叶荣钟内心的失落拯救了过来，进一步引发他的认知上的同情、尊重和共鸣”，并成为“他与祖国的沟通点”^[56]。正是在这里，叶荣钟模糊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得到了来自贫弱的祖国的呼应，从而形成一种与中华民族、中国民众的命运共同体，建立了一种比面对一个河山壮美、文明发达的祖国更深刻而坚定的民族立场。这样，叶荣钟也就超越了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将自己融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之中，深刻地理解了鲁迅国民性批判对民众的关怀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构。

在台湾，这样的民族认同形成的情感转换机制并非个例。陈映真也是通过《阿Q正传》“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而了解到“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并认定“这中国就是我的”^[57]——“鲁迅作品虽描写中国的落后与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关怀和热爱；……鲁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讽刺，但比讽刺多好几百倍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和爱护。因此，我从小就笃定这国家是我的，我要爱护她。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58]正是鲁迅，让陈映真能够正视中国的苦难和落后，并“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而非成为一个对此“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甚至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人。”^[59]在叶荣钟和陈映真这里，由于深刻地理解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背后的深沉的爱，也就理解了鲁迅并非民族文化的虚无者，反倒是新的民族文化的建设者。无论对于鲁迅，还是理解了鲁迅的叶荣钟和陈映真来说，破败的祖国、羸弱的人民从来不是被嫌弃的对象，而是同情、帮扶、携手前行的同胞。

可以说，1933年的“安东经验”乃是叶荣钟理解“现实中国”的开端。由于日本殖民者和国民党当局严厉的思想管制，1943-1965年的二十余年间（除1946年随台湾光复致敬团参访大陆的42天）未记日记，让后人失去了直接了解叶荣钟内在思考的一个重要渠道。不过，有学者根据叶荣钟这一时期的汉诗揣摩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心境，指出他1950年代以后的写作中多处“暗示他对他所遥望的远方大陆有所期盼”^[60]。在生活中，叶荣钟确实非常关注大陆当下情况，他常常将日文报纸上关于大陆的消息裁贴成剪报。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叶荣钟早年通过汉诗和周作人关联到中国的“民间”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其文化民族主义的大前提。不过，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不必然带来对现实中国的认同，这已被余英时等海外华人学

徐纪阳，2025

者的思想和文化活动所证明。但综合叶荣钟晚年的大量手稿、书信及生命最后12年（1966-1978）的日记来看，他晚年的祖国认同超越了单纯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民族主义，朝向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这与其依赖早年的新文学经验而建构起来的思想的基本结构（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是分不开的。

5. 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理性抉择

1966年1月1日，在中断了二十余年之后，叶荣钟重新开始记日记。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解释了中断二十年多年而今又重启日记的原因：“光复以来特别是二·二八以后这十七、八年，极力避免欲记日记之心愿，因怕庸人自扰也。现在我年六六，已是老朽，没有人注意。写一些心中之不满概也不会引起麻烦才对；因此，重续这份日记。”^[61]话语之间既有对国民党当局政治高压的不满，更表达了以笔抒愤的决心。类似的话，叶荣钟在致好友的信中也同样表达过，洪炎秋回信对此表示赞同：“闭门写些杂文，吐吐胸中恶气，也不无好处”^[62]云云。

到晚年，叶荣钟思想背景中的左翼线索逐渐明朗。王诗琅注意到叶荣钟的历史学著作主要书写右翼运动而较少直接涉及左翼运动的特点^[63]，这种偏向从运动领导者思想与决策的归因解释历史过程，极易让人误解叶荣钟独尊少数菁英领导个人的思想与决策的影响，而缺乏整体政治经济的分析乃至国际情势的外部结构性考虑^[64]。实际上，从叶荣钟辟专章讨论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民众党”和简吉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运动”来看，其著虽以描写民族右翼的文化抗日运动为主，却也兼顾了左翼阶级革命的历史视野，跳脱仕绅阶级的视界限制。^[65]而尹章义在对照叶荣钟手稿与报刊本、单行本后有更重要的发现，叶荣钟手稿中大量与左翼相关的字词、言论乃至重要历史事实在公开刊行时都被删除，这自然是受台湾“戒严”体制的言论限制，同时也与联合署名的蔡培火等人的“监修”行为有关——也即，叶荣钟与蔡培火在

写史立场上存在微妙的“左右”矛盾。^[66]据林庄生回忆，蔡培火曾在信中向他提及“费尽心思修改全稿”的情景，而叶荣钟也在致林庄生的信中对蔡培火“过分的删改提出严重的抗议”。^[67]徐秀慧指出，叶荣钟在《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中“虽谨守林献堂秘书该有的分际，写出林献堂不得不与日人周旋的苦衷”，却在《台湾人物群像》中更为推崇始终不与日人打交道的民族诗人林幼春和具有左翼思想的蒋渭水。^[68]而将叶荣钟的《近代台湾金融经济发展史》与《台湾民族运动史》参照阅读，就会发现前书也已经以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描绘过台湾左翼运动挫折的历史背景。^[69]可以说，叶荣钟思想中的左翼线索不时显影于相关的文字中。

1974年，时在北美旅行的叶荣钟在给林庄生的信中谈及台湾的前途问题，他指出，“台湾问题之解决，在现阶段可以想象者似有三种方式，即国际管理、向中共认同与独立”，但“无论共管与独立皆可信其无补于事，然则台湾之将来除向中共认同以外似已无路可走”。其明确提出的三点理由分别围绕思想启蒙、左翼情怀与经济基础三方面展开：

其一，“台湾社会内在之缺陷，台湾人……有种种不可救药之弱点无耻、自私、卑怯、嫉妒、软弱等等，此种缺点与中国大陆解放前民众所有之缺点完全相同，除经一番血之洗礼而外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治暨社会体制都无法改变，尤有进者台湾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与国民党二十八年之压制奴役民族性之堕落达于极点，以寻常之手段无法救药。”^[70]

其二，除了要以左翼革命之手段完成对台湾人民的思想启蒙与国民性改造之外，叶荣钟还对“中共现在大力提倡之‘服务人民’”^[71]路线抱有期待，并予以辩证的分析，“中共也并非漂亮堂皇，也有其弱的暗的一面……然而建国仅二十年，要让那穷困污辱的中国更生，会有那种负面也不足为奇。我最在意的是，目前倾全力在推进的‘服务人民’的热情，能持续到何时，……我不免抱危惧感。”^[72]

徐纪阳，2025

第三，叶荣钟还从台湾的产业结构分析台湾未来的经济命运，认为“台湾在农业生产固可自给自足，但经济命脉与日本同样，是依工业制品的输出来维持外别无方法。但是一旦中共的工业制品登场国际竞争的场合，不必说台湾，连日本也受绝大的威胁。日本可转换往高度精密方向求活路，或输出丰厚的资本以吸收利润，台湾却全然无此可能性，（台湾的农工业产品现已发生输出不振的问题）就是中共无恶意，以现在台湾贫弱的工业基础，应该完全无法与之对抗。据此观点来说，对中共的认同问题，不管台湾的喜、恶，我想这是必然的趋势。”^[73]

如果说第三点是他晚年从事台湾金融史研究而获得的新思路的话，那么前两点仍然在他早年的启蒙主义与左翼探索的逻辑中，三者共同构成叶荣钟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决断，即对作为左翼政权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祖国统一抱有极高的期待：“贤明的中共领导者以他们过去那种细心而柔软的行事风格，看来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我想应不致于踏入遭受国际舆论非难之陷阱，更何况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正在推进和解外交的现在。”^[74]

在信中，叶荣钟还向林庄生表明，这“是我数十年来未曾吐露过的心情，……是永年郁积胸中之物”^[75]。这一方面说明他的上述立场和观点其来有自，乃是多年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台湾社会现实状况的极度不满，情绪的宣泄中包含了一种引/隐而未发的批判性。信中蕴涵的叶荣钟对台湾现实的苦闷和前途的无望，与他的日记多有呼应。譬如1972年2月22日日记有云：“近日常反省对时局尤其对台湾问题，我所采的态度是否对。”^[76]次日记载：“晚读小田岳夫著《鲁迅传》，不禁感慨系之，对于国民党当时残杀知识青年之暴虐尤为发指，一个政权若专恃杀人来维持，断难持久已得历史之证实矣。”^[77]与当年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一样，四十年后的他又一次经过“鲁迅”的中介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右翼本质。在晚年，叶荣钟对国民党当局的不信任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认

为台湾的前途与出路决不在国民党当局一方，他的民族主义立场又规范了他必须在民族的内部寻找台湾的希望。这时候，叶荣钟潜在的左翼情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终于将其导向对现实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像很多海外知识分子一样陷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虚相，只认同一个想象中的“文化中国”；或者像一些台湾知识分子走向建构虚假的“台湾民族主义”之路，跌入万劫不复的“台独”深渊。正如吕正惠指出的，“他对中共的肯定，同时具有满足民族感情和实现人间正义两种因素。”^[78]也就是说，叶荣钟思想中的文化启蒙主义、朴素的左翼情怀和对民族独立的毕生追求，最终在“国家统一”的议题下汇合，在趋向“中共认同”的过程中获得了思想的自治。可以说，这是周氏兄弟共同象征的五四启蒙主义、左翼关怀、民族意识在叶荣钟思想中持续作用的结果。因此，从叶荣钟晚年对中国前景所做的充满信心的预言来看，他早年建基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左翼情怀基础上的思想，此时已经形成相互支撑的稳定结构。而这是和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的。

6. 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理性抉择

叶荣钟生命晚景中的那种苦涩抑郁，多少和“苦雨斋”中的周作人有所呼应。晚年叶荣钟面对台湾现实无可奈何的彷徨而引发的“身轻无力谋归宿，一任东风恣意吹”^[79]的苦境，在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中也昭然若揭。少有人关注的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叶荣钟转向对庄子的阅读，大概是对内心苦闷的一种安慰吧，其逃避现实的隐士心境，与周作人是类似的。据日记，在1973年的3-6月间，他陆续读完福永光司的《庄子》、陈鼓应的《庄子哲学》和诸桥辙次的《庄子物语》。3月19日，叶荣钟在日记中记到：“读完福永光司的《庄子》颇有所得。”^[80]福永光司在该书后记中说，《庄子》不仅是一本慰藉心灵的书，还是一本教人在悲惨中微笑、赋予其不屈不挠之心的

书^[81]——这正是叶荣钟之“所得”，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叶荣钟隐于苦难的大泽的一面被凸显，而趋于挣扎、搏击的一面却被忽视了。而一旦无法从现实的苦楚中挣脱，他也选择过与庄子、周作人相反的路径，喊出“秃笔一支谁可夺，余年又欲扫千军”^[82]的豪迈之音。在《台湾民族运动史》的署名问题上，他投书抒愤，不惜公开与蔡培火决裂，“结束五十年之交谊”^[83]，那奋力搏击的姿态颇有鲁迅遗风。显然，这已经不单是著作权的归属之争，更是与委身其间的右翼民族运动路线的决裂，其思想中长期内隐的左翼脉络在晚年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影迹。

参考文献

- [1] 张良泽. 叶荣钟先生作品概述[J]. 台湾文艺, 1979年3月号.
- [2] 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纲[J]. 文学界杂志社, 1987.
- [3] 彭瑞金. 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J]. 自立晚报社, 1991.
- [4] 如施懿琳、廖振富皆以叶荣钟记录“二·二八”事件的汉诗为例，证明叶荣钟自“二·二八”后即转变为“台湾中心”历史观，具有鲜明的台湾“主体意识”。见施懿琳. 台中地区古典诗编注期末报告书[M]. 台中：台中市文化局, 2021. 廖振富. 不有真情不作诗——读叶荣钟诗集《少奇吟草》[J]. 台湾日报, 2001年4月12日.
- [5] 如陈昭瑛以叶荣钟祖国山河的一角为例，认为叶荣钟、庄遂性等日据时期台湾文化人的台湾意识是与祖国意识重叠的。见陈昭瑛.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J]. 中外文学, 1995年2月, 第23卷第9期.
- [6] 廖振富. 论叶荣钟诗作手稿及其相关资料之研究价值[J]. 台湾文学学报, 2006年12月, 第9期.
- [7] [31][65][68] 徐秀慧. 文学、民族、革命——鲁迅与台湾文人叶荣钟[J]. 鲁迅研究月刊, 2016年, 第10期.
- [8] [27][61] 叶荣钟. 叶荣钟日记（上）[M]. 台中：晨星出版社, 2002: 37、19、269.
- [9] 发表于1930年的《中国新文学概观》数次提及鲁迅和周作人，1932年2月、7月发表的两篇《文艺时评》都只提及鲁迅而未涉及周作人。在其它叶荣钟生前发表、出版的文字中，未见有涉及周氏兄弟的文字出现。叶荣钟. 《中国新文学概观》[M]. 东京：新民会, 1930.
- [10] 在一份手书于1945年的“鲁迅著作目录”中，叶荣钟列出所藏鲁迅著作如下：《热风》《坟》《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朝花夕拾》《而已集》《引玉集》《准风月谈》《两地书》

- 《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鲁迅自选集》《鲁迅文学讲话》《集外集》《三闲集》《二心集》《不三不四集》《鲁迅杂感选集》《门外文谈》《伪自由书》《夜记》《故乡》《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等。而据其日记统计及一份约编于1972年8-9月间的藏书目录来看,叶荣钟藏书中有鲁迅的著作有《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商务)、《桃色的云》(北新)、《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伪自由书》(北新)、《朝花夕拾》(未名社)、《热风》(北新,1934年9月16日记载重读该书,“颇有新获”)、《华盖集》(北新)、《华盖集续编》(北新)、《而已集》(北新,重复2册)、《小说旧闻钞》(北新,1932年12月7日日记载曾当日读该书)、《壁下译丛》(北新,重复2册;日日记载该书1932年1月20日购于中央书局),以及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北新);有关周作人的藏书有《欧洲文学史》(商务)、《谈龙集》(开明)、《谈虎集》(北新,上下册)、《永日集》(北新)、《泽泻集》(北新)、《周作人书信》(青光)、《苦雨斋序跋文》(天马)、《瓜豆集》(宇宙风社)(其中《周》《苦》《瓜》是1941年8月22日在日本东京神保町内山书店所购,当日日记还记载读周作人《关于鲁迅》)、《苦竹杂记》(良友)、《风雨谈》(北新。据1941年8月20日日记载“读完周作人著《风雨谈》”语,推测该书应购于本次旅日期间)、《雨天的书》(北新)。此外,在其“1941年读书目录”中还列有小田岳夫《鲁迅传》、周作人《苦茶随笔》。在“读书目录——1974年5月”中列有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
- [10]相关争论见鲁歌.《惜花四律》应是鲁迅、周作人合作[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张自强.《惜花四律》作者及创作时间和原因[J].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12期.顾农.《惜花四律》仍应收入《鲁迅全集》[J].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9期.倪墨炎.《惜花四律》不能从《鲁迅全集》中删去[J].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陈福康.关于新版《鲁迅全集》该不该删去《惜花四律》的争论[J].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1期.
- [11]叶芸芸、叶光南、叶蔚南.叶荣钟年表[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
- [12]陈昭瑛:谁召同胞未死魂——叶荣钟《早年文集》的志业与理想,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49.
- [13]庄遂性曾于1926年“亲自赴上海,选购书籍文具,以后商务印书馆、开明、世界、中华等书局所发行的书籍刊物,源源送来”,参见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年:313页.蒋渭水创办于1926年的文化书局,宗旨在于引进中国大陆“新式汉文书籍”以利“台湾文化之进步”,参见台湾民报1926年6月6日关于文化书局开业的广告。
- [14]叶蔚南.父亲叶荣钟的民族意识及其著作[J].观察,2016年1月,第29期.
- [15]叶荣钟手稿,原件藏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编号YZ000000001874.
- [16]该文于“五四”运动10周年之际着手写作,写毕于1929年11月7日,1930年6月由东京新民会出单行本。
- [17][19]叶荣钟:《南音》发刊词,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59-260.
- [18]叶荣钟:戏曲与观众——答紫鹃女士,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12.
- [20]叶荣钟:智识分配,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86.
- [21]叶荣钟:“大众文艺”待望,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63.
- [22]陈昭瑛:谁召同胞未死魂——叶荣钟《早年文集》的志业与理想,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59.
- [23][48][51][55]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52、273-274、248、242-243.
- [24]叶荣钟: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息,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274.
- [25]叶荣钟:《台湾民间文学集》可以给予高评价,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311-312.
- [26]石美玲.话语实践与社会变迁:以日治时期《台湾民间文学集》“民歌”为例[J].中兴大学中文学报,2018年6月,第43期.
- [28]黄春成.谈谈《南音》[J].台北文物,1954年8月,第2卷第3期.
- [29]洪铭水.叶荣钟论“五四”新文学与“第三文学”的提出[J].台湾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
- [30]张桂华.苦闷时代下的文学——1932年南音的文学诉求[D].台湾:台湾成功大学,2000.
- [32]叶石涛.旧文人·新知识分子——叶荣钟[J].文学台湾,1998年7月.
- [33]崔末顺.现代性与台湾文学的发展(1920-1949)[D].台湾:台湾政治大学,2003.
- [34]许倍榕.30年代启蒙“左翼”论述——以刘捷为观察对象[D].台湾:台湾成功大学,2005.
- [35]赵勋达.“文艺大众化”的三线纠葛:一九三〇年代台湾左、右翼知识分子与新传统主义者的文化思维及其角力[D].台湾:台湾成功大学,2009.
- [36]张俐璇.建构与流变:“写实主义”与台湾小说生产[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 [37]陈芳明.现代性与本土性:以《南音》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湾作家与民间想象[C].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98年编.
- [38]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109.
- [39]黄月银.左倾还是右转——叶荣钟第三文学论[J].华文文学与文化,2018年,第6期.
- [40]林书扬: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发展——第一周期与第二周期,林书扬.林书扬文集(1)[M].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123.
- [41]叶荣钟:堕落的诗人,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185.
- [42]张重岗.叶荣钟与台湾的民族主义问题[J].海峡人文学刊,2022年,第1期.
- [43]张重岗.叶荣钟与20世纪30年代台湾的言论空间[C].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语言寻根 文化铸魂——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238-239.
- [45]施淑.文协分裂与一九三〇年代初台湾文艺思想的分化[C].两岸文学论集1:文学星图,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18.
- [46]叶荣钟:祖国河山的一角——东北安东县的印象,叶荣钟.半壁书斋随笔(下)[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40.
- [47]赵京华.周作人的民族国家意识[J].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 [49][79][82]叶荣钟.少奇吟草[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91、239、240.
- [50]洪铭水:叶荣钟论“五四”新文学与“第三文学”的提出,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M].台北:晨星出版社,2002:56.
- [52]张良泽.叶荣钟先生作品概述[J].台湾文艺,1979年3月,第62期.

- [53]廖振富. 以文学发声——走过时代转折的台湾前辈文人[M]. 台北: 玉山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17: 226-227.
- [54]叶荣钟: 祖国河山的一角——东北安东县的印象, 半壁书斋随笔(下)[M]. 台北: 晨星出版社, 2002: 42.
- [56]马臻. 阿Q与陈映真、叶荣钟——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及其反思[C]. 叶荣钟与重写台湾文学史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2022: 198-199.
- [57][59]陈映真: 鞭子和提灯——代序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 陈映真. 陈映真全集(第3卷)[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2017: 366.
- [58]陈映真在香港浸会大学“鲁迅节座谈会”上的讲话[J]. 大公报(香港), 2004年2月23日.
- [60][78]吕正惠: 历经沧桑一文人, 叶荣钟. 叶荣钟选集·文学卷[M]. 台北: 人间出版社, 2015: 21、28.
- [62]洪炎秋1966年8月1日致叶荣钟信, 原件藏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 编号YZ00000006254_001-070400450043.
- [63]王诗琅. 台湾民族运动史[J]. 华学月报, 1972年7月1日, 第7期.
- [64][69]陈柏谦. 一个互为参照的阅读叶荣钟视角[J]. 两岸彝报, 2017年1月24日, 第141期.
- [66]尹章义: 舍我其谁的史家和客观环境的互动——手稿本《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和报刊本、单行本《台湾民族运动史》的比较研究, 见叶荣钟.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M]. 台北: 晨星出版社, 2000: 647-672.
- [67]林庄生. 怀树又怀人: 我的父亲庄垂胜、他的朋友及那个时代[M]. 台北: 玉山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17: 213、187.
- [70][71][72][73][74][75][76][77][80]叶荣钟. 叶荣钟日记(下)[M]. 台北: 晨星出版社, 2002: 1207、1208、1209-1210、1209、1209、724、724、830.
- [79][82]叶荣钟. 少奇吟草[M]. 台北: 晨星出版社, 2002: 239、240.
- [81]福永光司. 庄子内篇读本·后记[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300.
- [83]叶荣钟.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M]. 台北: 晨星出版社, 2002: 646.